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

LI ZHI YU WAN MING WEN XUE SI XIANG

左东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

LI ZHI YU WAN MING WEN XUE SI XIANG

左东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 / 左东岭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2-007786-1

I. 李… II. 左… III. ①李贽(1527~1602)—思想研究
②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国—明代 IV. B248.915 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5803 号

责任编辑:胡文骏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印制:李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2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7786-1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罗宗强

读历史,有时候让人感到乏味,这个上台那个下台,这个成功那个失败,留下的就是一笔流水帐,让以历史为职业的学者们在那里慢慢地清理,消磨岁月。但是,有时候,读历史却让人激动不已。我在读魏晋时期的历史时有这种感觉,在读万历前后的历史时也有这种感觉。仿佛跨越过时间的阻隔,得到了心灵的沟通。在读这些时期的历史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群活的人,在你的面前毫无保留地坦露自己。他们不顾环境与传统的固有模式,完全按照自己的欲望尽情地生活。是与非,功与过,一切在所不顾,听由后代去评说。在读这样的历史的时候,你会没有戒心,会同其悲,同其乐,然后去判断是非。

能够做到毫无保留地坦露自己,这在我国的传统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国古代的相当一部分士人,常常喜欢在公开的场合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在私下里,却另是一副嘴脸。按李贽的说法,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当然,李贽是极而言之。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不一定是品质极坏的人。因为在我国古代的社会里,儒家思想是政治、伦理、法律诸领域的指导思想,士人入仕,如果在公开的场合里说违反儒家思想原则的话,他在仕途上便会遇到困难,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不得不说一些与自己的真心相违背的话。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不仅为我们研究

历史带来困难,更主要的是不利于思想的活跃,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当然,也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培养。

能够毫无保留地坦露自己,往往出现在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万历前后就是这样的时期。这个时期里的一位突出的人物,便是李贽。李贽是我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敢说真话的人物中很有特色的一个。就像思想活跃时期各种思想并存、精华与糟粕同在一块,敢于说真话的人物的思想里亦往往新旧杂糅、精华与糟粕同在。而且又由于我们在对待这样的人物的时候,各人所持的标准不同,是非的判断因之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贽就是这莫衷一是的很突出的一位。因了他的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当时和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他都被目为异端而屡遭非难。亦因了他的不同于传统的思想与行为,他被各式各样地赞美过,他曾经被目为“儒教叛徒”,“以身殉道者”,曾经被目为“进步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在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特异的时期,他甚至被目为法家而成为显赫一时的英雄。他似乎是一位多面人,无论你从哪一面看都像,不过,无论你从哪一个方面看,他都是一位让人不得不动心的人物,一位无法让人不研究,而又很不容易研究的人物。

研究李贽,其实涉及到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例如,他和儒学、特别和王阳明心学的关系,和庄禅的关系,涉及到万历前后士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涉及学术史,文学史,当然,最重要的,是涉及我们在历史研究中的是非标准。李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评价他的时候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分寸之间,既可肯定,又可否定,肯否之间,殊难把握。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当我们说到李贽和儒家正统思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想起王夫之说的“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想起顾炎武说的“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基于李贽”。同时,我们也会想起马经纶在为李贽辩护时说的李贽“乐圣人之道,诤圣人之道”。

经……真上足以阐羲、文、孔、孟之心传，下足以绍周、邵、陈、王之嫡统”的话。当我们说到李贽在人性的认知与阐扬上的贡献时，我们同样会遇到完全不同的评价。我们该在何种程度上肯定人欲？这个问题不仅面对如何评价李贽，且亦涉及对于晚明文学思潮的评价，涉及现实人生的走向。对于李贽的狂狷，同样存在一个评价尺度问题。还可举出许多，李贽研究中无处不存在争议，无处不存在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在李贽研究上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而由于李贽的复杂性，和评价标准的差异，这些争议恐怕是还要存在下去、这些问题恐怕也还要不断研究的吧。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清理李贽思想和行为的方方面面，描述出他复杂的完整的人生与人格，细心地清理万历前后的历史的真实面貌，而不是论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对于李贽也许可以有深一步的认识，如果我们不囿于固有的模式，而是从思想发展的史的角度，衡量某种思想在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眼界更开阔一些，我们对于李贽的评价或者会有一个新的深度。

门人左东岭，好学深思，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日以继夜，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对于王学与李贽思想的性质与关系，钻研尤力。我以为，他对于万历前后的历史，对于李贽的人生、人格与思想的方方面面，是深入了解了的。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正德、嘉靖两朝，士人心态、阳明心学与文学思想三方面，均缓慢地曲折地朝着表现自我、愉悦人生的方向发展，三者同时又存在着种种的矛盾与错位。这就是李贽思想产生的背景。他又认为：在李贽的人格中，有着顽强的圣人意识，这包含着入世圣人与出世圣人双重内涵的圣人意识，为其狂放怪异人格之核心。他还认为：李贽的心性理论中有着两个核心命题，一是追求自我解脱的性空理论，一是追求真诚自然的童心说。它以真为核心，包含着心性的空与道德之诚，亦包含着自私自利等不同层面，形成其独特的自然人性论、无为顺性政治观与求实之学

术思想。我认为,东岭的这些见解,是言之有据,是相当深刻的。他对于李贽文学思想的分析,亦有相当精彩的地方。当然,由于时间的限制,在描述李贽对晚明文学思想的影响时,还缺乏深度。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文学思想涉及的面极广,要认真的研宄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在短短的两年里,是不容易做到的。

近年来,眼看着年轻人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中迅速地成熟起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我所知,陈洪、张毅、卢盛江在这个领域里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东岭也是他们中的一位。我衷心地祝愿他们在艰辛的学术之路上不断地取得进展。

1995年冬夜于南开大学北村之寓所

目 录

序	罗宗强 1
第一章 李贽所面临的历史前提	1
第一节 政教分离与士人品格之变化	1
一、武宗“失德”及其影响	1
二、世宗的独裁荒淫与士人的双面人格	7
第二节 王学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	15
一、王阳明所要解决的人生难题	15
二、王龙溪的哲学思考	24
三、泰州学派的人生追求	30
第三节 文学思想的演进与王学	36
一、前后七子文学思想的内在矛盾	36
二、王学诸人的文学思想	43
三、王学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关系	48
第二章 李贽的人格与心态	59
第一节 狂人与圣人	59
一、疏狂怪异的个性特征	59
二、狂傲孤高与圣人情结	63
三、李贽圣人情结的历史渊源与现实依据	67
第二节 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之一：出世圣人的追求	70
一、自我价值观之基础——“为己之学”	70

二、李贽为己之学的心理动机及其经过	74
三、随缘任运与自我超越	80
第三节 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之二:自我不朽的追求	86
一、自我价值与精神不朽	86
二、自我估价与不朽途径之选择	90
三、《藏书》之写作——著述以求不朽的具体实践	94
第四节 耿、李之争与李贽人格心态的发展变化	97
一、李贽人格心态发展的分期与标志	97
二、耿、李之争产生的原因与过程	99
三、耿、李之争对李贽人格心态的影响	104
第三章 李贽的哲学思想	117
第一节 李贽的学术渊源与终极关怀	117
一、心学与受用	118
二、老、庄与自我关注	122
三、禅宗与生命解脱	128
第二节 李贽的性空理论与自我解脱之道	135
一、李贽所言心性之内涵	135
二、空无心性之识取	143
三、空明心性之发用	149
第三节 童心说与李贽的人生价值观	153
一、童心说内涵与主旨辨析	153
二、真诚:一种重要的人格价值观	159
三、圣人与众人的群体分类	170
第四章 李贽的文学思想	177
第一节 自适:文学的目的	177
一、文学与人生自我	177
二、文学之四大功能	181
三、李贽的文学批评特色	188

第二节 作者:文学创作的首要因素	193
一、作者在文学“世界”中之位置	193
二、作者必备三要素:才、胆、识	196
三、作家之创作心境:虚灵	199
第三节 “自文”:文学的自然表现观	205
一、从自然之性到自然之文	205
二、李贽自然表现论之特征	211
三、“化工”:一种独特的自然表现观	217
第四节 “真”与“趣”:李贽的审美追求	226
一、“真”与“趣”的内涵及其关系	226
二、李贽“趣”的创作风格及其溯源	232
第五章 李贽与晚明文坛	242
第一节 李贽与公安派	242
一、李贽影响公安派之原因与途径	242
二、李贽对公安派人生观之影响	250
三、李贽对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影响	272
第二节 李贽与金圣叹	287
一、从容与堂本到贯华堂本	287
二、狂者精神与自我价值之追求	294
三、从重意到重法	300
四、金圣叹:晚明狂放思潮的终结	306
参考引用书目	320
后记	326
再版后记	328

第一章 李贽所面临的历史前提

作为思想家的李贽,其生前与死后均以其狂怪而著称于世。的确,李贽的人格心态、哲学观念及文学主张,比其同时代人都更具狂怪色彩。然而这狂怪特征显然被有意无意过分夸大。李贽本人无论如何不会超越其历史境遇,他所感受与思考的,均以其所面临的历史为前提。由此事先了解他所处的历史状况也就甚为必要。

第一节 政教分离与士人品格之变化

一、武宗“失德”及其影响

李贽所处的明代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也以政教合一为其政权特征。作为一位合格的皇帝,须成为勤政的表率与道德的楷模,以保证其作为文官集团仲裁者及精神领袖的资格。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而理想状态便非常人所能企及。既然皇位的获得是一种无可选择的世袭方式,则皇帝之不能人人皆为尧舜之君便属理所当然。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他本可为所欲为,获取比所有人都多的人生享受。但作为道德的象征物,又不得不放弃相当一部分享受而有所克制,并去从事批阅奏章、祭祀天地及接受群臣朝见之类既象征权力又索然无味的事务。但除此之外却别无选择,政教合一的施政原则要求的是社会群体的整齐划一而非个性突

出,看重的是社会稳定和谐而非个体之荣辱得失。换言之,它必须靠压抑个性与牺牲个人来换取王朝的安定太平。这适应于帝国的每一位成员包括皇帝本人。从本朝范围内讲,合乎此标准者并非绝无仅有,如太祖朱元璋及仁宗、孝宗便堪称楷模。文臣方面则有成祖时的三杨为表率。但压抑个性并不总有正面价值,它同时也将造成个性萎缩并导致政治局面的沉闷而缺乏活力。明王朝在经过近百年的运作后,就正面临着此种历史状况。

弘治朝被诸多明代士人视为中兴时期。作为此时王朝首脑的孝宗皇帝,理应被视为克己为国的典范。他准时出席经筵,不断发布减免水旱灾害地区赋税的诏令,虚心听取文官们的各种建议与劝谏。就个人生活讲,他终生只守着皇后一人而没有嫔妃的记载,可算是位兢兢业业的守成之君。然而在其临终的弘治十八年,年轻气盛的李梦阳却向他呈上一封长长的奏折,断言国家已染“元气之病”,说是“今人不喜人言,见人张拱深揖,口呐呐不吐词,则目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圆巧而委曲,则以为善处。是以转相则效,翕然风靡”。(《空同先生集》卷三十九《上孝宗皇帝书稿》)所谓“老成”实为“老气”,亦即缺乏活力。因为士人阶层乃是王朝的栋梁,士气不振亦即元气不振,则政治局面自然便随之沉闷而无生气了。

首先打破此种沉闷局面的是那位浪漫得近乎荒唐的明武宗。他一生有两大特征:(一)无休止地追求个人享乐而不受伦理道德的制约。作为孝宗独生子的武宗,其好逸乐之习性在做太子时即已形成,以致孝宗在遗诏中特意叮嘱大臣:“东宫年幼,好逸乐,卿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明通鉴》卷四十)但导致武宗逸乐的主要原因应为对宫廷单调生活的厌倦。如武宗在京城内开设酒肆店铺,有大臣上书问:“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兢锥刀之利,如倡优馆舍乎?(《明史》卷二百八《齐之鸾传》)文官们显然不能理解皇上的内心世界。他当然不是为谋利,而是要品尝社会生活

的丰富多彩,故史书载:“上令内侍仿设麀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询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卷所张酒肆者也。坐当炉妇其中。上至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处。”(《明通鉴》卷四十二)因而当正德九年武宗所居乾清宫被一场大火烧成灰烬时,他反倒幸灾乐祸地对左右说:“是一棚大烟火也”。(《明史》卷三百七《江彬传》)并趁机搬出大内,干脆将行宫建在宣府。无论大臣如何反对亦不肯回京居住。

正德皇帝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崇尚武功。他始而在豹房搏虎,继而在宫中练兵,最后亲统六师与蒙古骑兵开战。武宗之尚武不像对其他爱好那样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而颇为严肃认真。他具有顽强的个性与冒险精神,觉得艰苦的军旅生活比处理政治事务更富刺激性。他更渴望做一位将军而不是守成的君主,故而初始称总兵官,继之称威武大将军,那次边境战斗结束后还要加上公爵的俸禄。放着好端端的皇帝不做,偏要自我降级为一名武将,难怪大学士杨廷和会大惑不解地问:“不知陛下何为而乐此乎?”(《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四)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戎马征战中更能证实武宗的真正自我价值。皇帝固然尊贵,却是祖宗留下的法定头衔,别人不能做,他也不能不做,但兵却是他亲手练的,故可称总兵官;仗是他亲自打胜的,故可荣升大将军并加公爵,尽管文官们并不承认其胜利。当皇上征战归来接过大学士杨廷和捧上的庆功酒一饮而尽时,他颇为欣喜地讲:“朕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同上卷一百八十五)从其语气中,不难感受到他那自豪满足的心态。一个“亲”字,证明了他个人的真实价值,不靠祖宗成宪,不靠众人虚誉,而是他朱寿自己所为。

武宗的为所欲为自然要付出代价。他运用皇权取得了行动的自由并最大限度地伸展了其个性,却同时又完全放弃了皇帝所应负的基本职责。他那建立在百姓痛苦之上的纵欲淫乐与军事冒

险,除却满足其自身的情趣与想象力外,非但未能给王朝带来活力,反倒使朝政更趋混乱。在其为帝的短短十五年内,有两位亲王发动武装叛乱,说明他们已将王朝的政治混乱估计到可以乘乱而代之以的程度。来自朝廷内部的批评同样严厉而众多,或责其好勇好货,或讥其嗜酒荒淫。有的指斥则带有总体性:“陛下临驭以来,祖宗之纪纲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倖,又再坏于边帅之手,盖荡然无余矣。”(《明通鉴》卷四十八)诸如此类的奏折雪片似地飞至武宗面前,并终于在正德十四年皇上拟出巡南方时达到高潮。文官集团采取集体示威的方式抗议皇上的荒唐行为,尽管有百余位官员被罚跪五日并有十五人遭廷杖后身亡,但皇上迫于强大压力也不得不取消其南巡计划。武宗的失德显示出权力与德行并不总是一致,尊贵的皇上并不必然具备高尚品德。皇上有权力责罚官员,官员则可搬出先圣遗训及祖宗成宪与之顽强抗争。如正德十二年武宗出关时,尽管有皇上御旨,但守关御史张钦硬是仗剑坚守,拒开关门,皇上虽大为恼怒却只能悻悻而归。“又二十余日,钦巡白羊口。帝微服自德胜门出,夜宿羊房民舍。遂疾驰出关,数问御史安在”(《明史》卷一百八十八《张钦传》)。武宗的慌乱心虚正显示出其有亏于理。在此,再次证实权力与道德、政与教的分裂。

武宗在位虽短,却对士人人格的变化影响巨大。他的自我放纵使其尽失道德楷模的作用,他的荒唐举措既破坏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同时也助长风俗奢侈与动摇伦理道德的约束力。政教分裂使得权力与道德同时失去统一的标准与维系人心的力量,并促使士人人格的多元化。

首先是从温厚和平转向愤激孤傲。“彬彬有礼,俨然君子”,是明初士人的理想人格,而循规蹈矩,温柔敦厚则是其表现形式。至正德年间,此种人格已不为多数士人所看重,当时人所称誉的乃是仗义敢言,不计利害得失的耿介人格。如李东阳是公认的台阁

体作家,学问与才气均堪称一流。他在弘治、正德两朝均为大学士,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且与人为善,喜奖掖后进。他在弘治朝从容陈言,为孝宗所褒奖,君臣极为相得。但至正德时他却招致迥然不同的评价。事情起因于文官集团与宦官刘瑾的对抗。当时许多官员遭阉宦迫害,内阁大学士谢迁、刘健为此愤而辞职。李东阳则对刘瑾较为温和而未意气用事,且实际效果应不算太差,因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使天下阴受其庇。然而“气节之士多诽之。侍郎罗玘上书劝其早退,至请削门生籍。”(叶盛《水东日记》卷五)从此许多文官不放弃一切机会去弹劾这位先朝老臣。有位名叫张芹的官员,在东阳因平定宁夏叛乱而进官荫子时,立即上疏曰:“东阳谨厚有余,正直不足;儒雅足重,节义无闻。逆瑾乱政,东阳为顾命大臣,既不能遏之于始,及恶迹既彰,又不能力与之抗。脂韦顺从,惟其指使。……”东阳闻疏,“涕泣不能辩”。(《明史》卷二百八《张芹传》)疏中将“谨厚”与“正直”、“儒雅”与“节义”对言,则谨厚已有虚伪软曲之嫌,儒雅亦与全身远害结缘。其实,张芹在疏中已为东阳准备下一个颇为简练的称谓:“脂韦”,亦即圆滑媚软而没有节操。而此刻敢于仗义执言的李梦阳,却成为倍受青睐的英雄。

李梦阳素以直言敢谏称,早在弘治末年即以弹劾贵戚张鹤龄入狱而享誉文臣间。正德二年,他又因率先提议弹劾刘瑾而再次入狱。他曾自述说:“尝自负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贵死生毁誉动心,而后天下事可济也。于是义所当往,违群不恤;豪势苟加,去就以之。”(《空同先生集》卷六十二)他的此种个性有其自身的禀赋,他对名节极为重视,认为:“男儿落地既有身,谁能龌龊犹妇人。”(同上卷十八《君不见赠郑庄》)当然他的耿直中也并非毫无矫情成分,只是这种矫情多是为社会效果计,故而才直言不讳曰:“宁伪行欺世而不可使天下无信道之名,宁矫死干誉而不可使天下无伏义之称。”(同上卷四十《大梁书院田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终于铸成其孤傲的人格并产生出直言敢谏的勇气。但他的忠直虽见赏于弘治时，在正德朝却倍遭摧折。他虽有孤贞自持的节操，却无法改变朝政日非的现实。于是便转向愤激：“壮士愤国难，抚剑但徘徊。白日悠西倾，怆惋肝肺摧。”（同上卷十《杂诗》三十二首其十三）李梦阳的愤激来源于由时代落差导致的希望破灭。他认为弘治朝乃中兴之时，故时时梦到彼时的美景，而眼见正德朝的混乱，遂产生今非昔比之感。以作诗为例：“诗倡和莫盛于弘治……自正德丁卯（二年）之变，缙绅罹惨毒之祸，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叠息，而前诸倡和者亦各飘然萍梗散矣。”（同上卷五十八《朝正倡和诗跋》）当年写《洛阳陌》时表示：“举手谢乡人，荣耀但区区。丈夫树名勋，所志在唐虞。扬袂径北去，万里谁能拘。”（同上卷六）不料等待他的却是正德间的人狱与革职，什么个人的“名勋”，国家的“唐虞”均已成为泡影。于是李梦阳的心态也就由愤激转向悲凉。在罢官居家时，他常常披衣夜起，面对寒声湿气，聆听雁叫蛩吟，忍受着沉闷孤寂的折磨，渴望“谁能奋长剑，割破黑云层”。（同上卷二十八《秋雨夜起》）他有时也极力自我开释，欲学邵雍筑安乐窝以自适，可终于阻不断“悲凉气转增”（同上卷二十七《深秋独夜》）。故而愤闷悲凉构成其诗作的晚年基调。李梦阳一生倡唐诗之正大雄浑，并不惜刻意摹仿，最终却不得不落脚于愤激悲凉的变徵之音，而此方为其诗之真情所在。诚如其《张生诗序》所言：“故声，时则易；情，时则迁；常则正，迁则变；正则典，变则激；典则和，激则愤。故正之世，二南锵于房中，雅颂铿于庙庭；而其变也，风刺忧惧之音作而来仪率舞之奏亡矣。”（同上卷五十）从弘治到正德，显然是由正到变的转换，则梦阳诗作由典正转向愤激亦为必然之势。其实此种转换又何止空同子一人，当时文人虽心态各不相同，诸如大复之凄惋，康海之放浪等，但在愤激悲凉上却均与梦阳同。

其次，从依附圣贤权威到独立自足。这可以王守仁为代表。

阳明先生以致良知的心学而成为一代宗师，而其心学的真正形成却恰在正德年间被贬于龙场驿时。王阳明成圣之志甚早，为此曾涉足于儒释道兵法各种学问，却总不能与己心相合，有一次为体验朱子格致之学，曾面竹格物七日而病倒。而一旦至贵州那远离朝廷的荒山野岭中，陪伴他的多是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在这生死攸关的当口，所有的凭借均已失去：朝廷之公正已不复存在，外在的道德律令已无以解决其人生难题。古代圣贤无法替代其窘迫处境，于是不得不坐下来独立思考一切，从而建立起他的心学体系。阳明弟子罗洪先曾追述此事说：“及其摈弃流离于万里绝域，荒烟深菁，猩鼯豺虎之区，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既无一可骋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去之有不可。辗转烦聒，以需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持，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我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阳明全书》卷三十五《年谱》）阳明心学的建立原因自然颇多，诸如程朱之学之衰落，白沙之启悟等等，然正德朝之种种变故，却不能说不是阳明之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契机。当然，在被朝廷抛弃之后，人们所独立思悟的肯定不全是圣学，如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文人便走向了人生享受，且其价值并不低于王学。对此下面将叙述，兹不赘论。

二、世宗的独裁荒淫与士人的双面人格

正德皇帝的任性无疑败坏了朝廷，但他本人对文官集团的干涉尚不十分严重。他只按自我之兴趣行事，尚未蓄意摧折士人之气节与人格。尽管在刘瑾专权时有焦芳等不顾名节的“阉党”出现，但文官集团在整体上仍未失去忠奸、贤愚、正邪等伦理标准，故在劝谏武宗时能够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嘉靖朝则由于世宗的独裁荒淫从而对士人人格造成极大的扭曲。此乃正、嘉两朝之一大